

# 梅贻琦和清华传统精神

钟秀斌

刚刚翻过日历的2014年12月29日，是伟大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诞辰125周年纪念日。尽管他已离世半个多世纪，但人们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他、缅怀他。2012年5月16、17日，凤凰卫视名嘴梁文道先生分别在两期《开卷八分钟》栏目中，借评价《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黄延复、钟秀斌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之机，引导观众怀念梅先生。2012年8月，十集电视纪录片《先生》亦有专集报道梅先生一生功业，引起观众热烈反响。2012年10月26、27日，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举办梅贻琦校长逝世50周年纪念研讨会，两岸清华、云南师大、厦门大学等高校领导者与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学者近百人云集新竹，咸怀梅先生之德风。

在梅贻琦先生诞辰125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他山高水长的行谊风范，追忆他为民族、为社会、为时代带来的斯文。感激之余，人们也许会思索，梅先生执掌清华17载（1931~1948年），正是社会动荡、民族危急的苦难岁月，同时又是大师云集、英才辈出的黄金时代，他究竟给清华带来或者说留下了什么？

诚如已故清华大学资深校史学者黄延复先生指出，清华百年与国运紧密相联，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传统精神，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在这些传统精神的照耀下，百年清华才会呈现出大



梅贻琦 1935年校庆日于清华园



西南联大举行报告会，梅贻琦主持会议



梅贻琦与早期清华校友在一起。前排右起：胡适、梅贻琦、赵元任。后排右起：蒲薛凤、杨锡仁、周象贤、李鸣合、陈伯庄、程远帆

师云集和英才辈出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继承和创造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

了解清华历史的人大都

知道，早年清华因为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再加国运艰难，社会动荡，清华校长难当，长则三五年，短则一两年，其中任

期最短的只有两个月。但是，梅贻琦先生自1909年被遴选为首届庚款留美生后，就与清华结缘。1915年起担任清华教职，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北京清华大学和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31年【其中北京清华大学17年（1931~1948），旅居海外保管清华庚款基金6年（1949~1955），创办新竹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7年（1955~1962）】。

梅贻琦先生以大师论、通才教育、自由学术和教授治校的教育思想和忠诚无私、刚毅仁爱的人格魅力诠释了清华精神。在他掌校清华期间，清华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民族培养了众多栋梁之才（据统计，1955~1980年3次遴选出中国科学院473位学部委员中，有194位约41%出身自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发出耀眼的光芒。

###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作为寡言君子的梅先生，以无言的身教体现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他出身于没落的书香之家，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复杂的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信念不坚定，追求不执着，缺乏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绝不可能练就服务社会、报效民族的工作能力；如果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修养品行，铸造高尚人格，绝不可能坦然直面

现实，淡然处之，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在日寇大举进犯的抗战初期，梅先生领导清华大学先是从北京城迁到长沙。还没站稳脚跟，就不得不在炮火纷飞中继续南迁到西南边陲，最后暂时稳定在昆明，与北大、南开两所风格迥异、规模不一的大学合组西南联大。战时物质条件的艰苦，远远超出了现在人们的想象，斯文的教授和活泼的学子们常常为吃口饭而发愁，许多教授和学生不得不到当地中学去兼课，教授夫人们则摆起小摊，以取得额外的收入来弥补日常用度。闻一多教授以篆刻图章为副业，梅贻琦夫人则常常摆摊卖小糕点济贫。

在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情况下，梅先生作为三校的核心领导人，却以高超的领导才能和高尚的品德，赢得师生们的广泛信任。学者同舟共济，学生忘我求学，八年时光，三校师生“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先后为民族复兴事业输送两千多名杰出人才，为抗战前线输送八百多名优秀的从军学生。西南联大学子们卓越的成就，书写着世界高等教育传奇。而这传奇的铸就，与梅先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是息息相关的。

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华师生和校友为梅贻琦先生服务母校25周年举行了一次公祝会。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

席林森特送“育才兴邦”四字匾额，以资嘉奖。而梅先生的美国母校伍斯特理工学院破例允许他缺席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该校原本早在五年前就决定授予梅先生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毕业后做出的卓越成就，但规定必须本人亲自莅校受领荣誉学位。梅先生数度以“校务正忙，且时局不靖，未便远离，遂即复谢”婉辞）。在各界名流致辞祝贺之后，梅先生谦逊而真诚地答谢：“……方才承龚先生（即龚仲钧，时为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勉励，再为清华服务25年。如‘天假之年’，本人固然很愿做。但是即使我能活到七八十岁，在这以后的廿余年，未必还能有大用处，那么爱清华的人，必不愿以老朽累清华。不过，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他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

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停，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行胜于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在梅先生的不言身教中，润物无声，芳泽远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清华人。

###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梅先生能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离不开他一生坚守的信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出自文史大师陈寅恪先生之笔。1929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逝世两周年，清华大学树立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以资纪念。陈寅恪先生撰写了一篇著名的纪念碑文，揭示出教书育人事业中万世不变的哲理：“……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清华领导人，右起：叶企孙、冯友兰、吴有训、梅贻琦、陈岱孙、潘光旦、施嘉炆

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文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石破天惊，成为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明灯。

梅先生从事教育的一生，实际上是服膺和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生。他在长年的办学生涯中，一直坚持自由学术信念，使教育不受时势、政党或政局所左右。据清华大学历史学家、哲学家何兆武先生回忆，他在西南联大求学七年间，尽管梅贻琦校长当时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从未在治校中倡导党义，而是以通才教育和学术自由理念来指导办学。

事实上，梅先生也多次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自由学术的向往。1945年10月28日，抗战胜利不久，而国共纷争潜流涌起，他在日记中写道：“……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在梅先生看来，学术自由，就是必须要有不受时局所左右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否则教育就是空谈。在捍卫清华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方面，梅先生无疑为教育家们做出了榜样。尽管作为名校校长，他不得不“遵命”加入国民党，并被擢拔为

中央委员。在不损害学术研究质量的情况下，清华各种研究所研究的主要项目基本上都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相一致，而这恰恰是梅贻琦教育思想光辉所在，因地制宜，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编织战时学校教育与国家需要之间的紧密纽带，不仅塑造学生爱国精神，而且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而在教育方针、课程安排、民主治校、学术自由等方面，梅贻琦坚决和师生一道进行必要的斗争和抵制。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多次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思想激进的教授，梅先生根本不予理睬。一些由当时教育部制订的教学上的规章制度，也由于广大师生的抵制和反对，有些流于形式，有些“变通执行”。与其他学校相比，西南联大始终保持为一所民主自由空气较浓的学府。特别是后期，西南联大发展成为“民主堡垒”，一方面得益于梅先生的开明思想，另一方面更是他一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必然结果。

### 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是清华校歌中的一句。百年清华，就是一部东西文化合奏的交响曲。

清华初期，正是中国现代教育启蒙时期，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外籍师资占据了优势，他们传播了西方现代文明。

随着留美学子们完成学业相继回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已经拥有许多接受过海外良好教育的一流学者，如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叶企孙、吴有训、潘光旦等。他们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有精湛的西方科学知识，继续在清华演绎着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盛景。

作为清华学者的优秀代表，梅先生1909年赴美留学，1914年毕业，1915年秋应聘清华，教授物理学。1921~1922年再度赴美留学，并考察欧洲教育。

据曾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吴泽霖教授回忆：“清华初期，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为了弘扬基督教教义和帮助学生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它组织了许多课外‘查经班’，读英文圣经，学生是自愿参加，一些中外教师被聘担任指导，每班不超过十人，每周聚读一两次。梅先生是基督教徒，也被邀指导一个班，我和潘光旦都参加了他的班，圣经是用古英文译的，梅先生不是专攻英国文学的，在辅导阅读时不无困难。我们在阅读时所以尚能顺利理解，显然是梅先生事前费时推敲的结果。”晚年在台湾创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为解决师资短缺困难，他虽年近古稀，校务和社会公务繁多，但仍兼任研究生专业英语课程教师。

在他领导下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一方面不拘一格

地引进留学海外、学有所成的华人学者，使得学贯中西的大师云集清华；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聘请世界一流学者来校讲学。1934年，清华设立航空讲座时，梅贻琦邀请美国加州大学航空工程系德籍教授冯卡门（Th. Von Karman）任教，后因冯回国不能来华，他积极设法请来美国空气动力学专家华敦德博士（Dr. F. L. Wattendorf）来清华授课。经冯介绍，华敦德博士1936年2月到清华担任航空讲座教授，负责指导设计清华校内以及后来在南昌建造的两个风洞（后者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风洞之一）。他的求实精神和精湛的技术，给当时的清华师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935年，美国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 Wiener）到校任教，1936年世界数学会副会长、法国数学家哈达玛教授（J. Hadamard）到校时，已是七十高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来华讲学的法国科学院院士。

早期清华大学实行教师定期出国研究，并通过出席国际会议、出国讲学等方式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有的著名教授应邀出国讲学或出席国际会议。如萨本栋教授对于应用向量及量子电路论研究甚多，甚为国外同行所注意。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电机工程学会曾对此问题专门召开讨论会，确认萨本栋之研究结果已居领先地位。于是萨先生在出国休



20世纪40年代梅贻琦在办公室

假期间，先后分别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邀往讲演。同一时期，清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被德国自然科学院选为会员；袁复礼教授在西北地理考察中发现恐龙化石，被瑞典君主赠与“北极星勋章”一枚。

在广泛礼聘和向外派遣学者的同时，清华十分注意选派学生以及青年教师出国留学、进修或参加研究工作。1911~1929年，共派出游美预备部学生1279人。193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令清华招送留美公费生，由清华组织自行考选，每届25人，至1937年止，总共派出留美公费生93名，其中学习理工科的64名，约占2/3。

学术不分东西。梅先生将清华开放包容、自由学术的胸襟发扬光大，历史证明，他掌

校时期倡导对外开放，聘请国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或讲学，是使清华较快接近世界科学技术前沿、有效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大举措。当时清华不仅吸取了许多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从实验设备到图书数据，从课程计划到教科书，都学到了很多先进有益的东西。清华国际学术交流的成就，为我国近代国际学术交流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百年来，清华以梅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代先贤和学人们通过教书育人的实践，不断地丰富着清华精神的内涵，奠定了清华校格。梅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半个世纪了，但他留给清华、留给教育、留给民族的这些精神财富，它们的影响将是深远而不朽的。📖